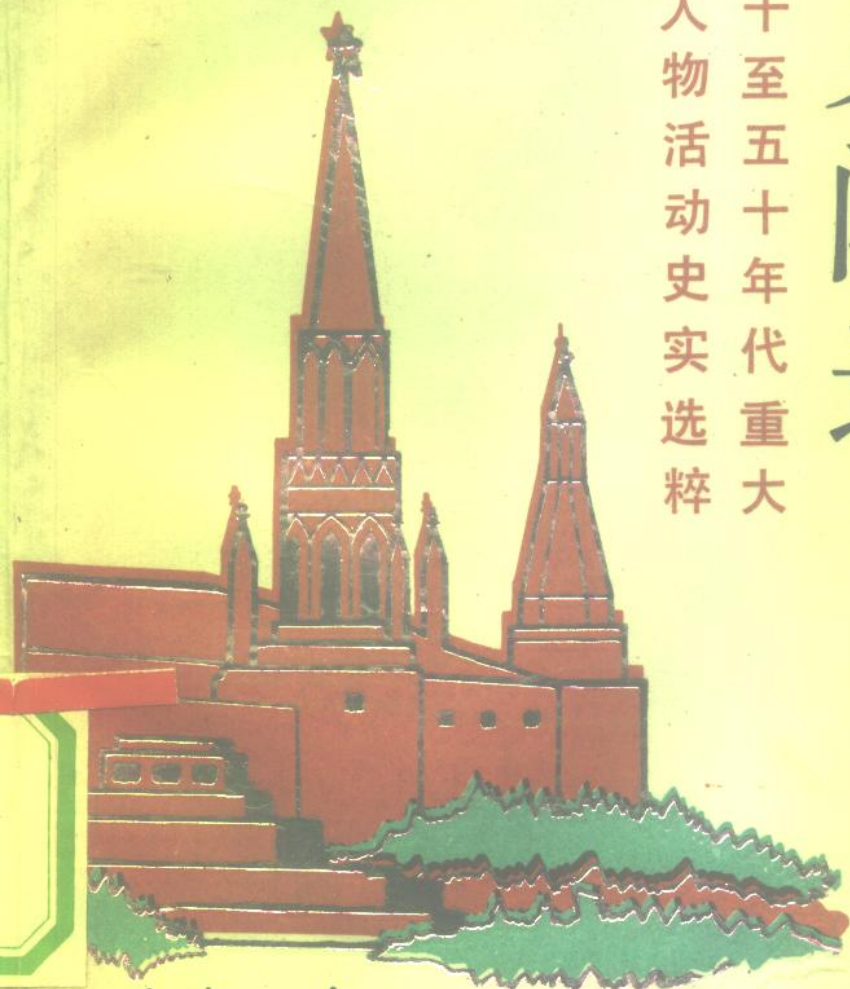


刘立凯 杨进保 编

红都见闻录

下

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重大
事件和人物活动史实选粹



经济日报出版社

周立波、陈逸飞、编

红都见闻录

下

苏联二十里五十里代
事件和人物的生动记录



上海人民出版

红都见闻录

——苏联二十至五十年代
重大事件和人物
活动史实选粹

(下)

刘立群 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十月革命历史实录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1)
在斯大林身边——和斯大林前秘书巴扎诺夫的谈话	乔治·厄本 (28)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马林	(49)
著名政治活动家鲁祖塔克	[苏]伊戈尔·东科夫 亚历山大·尼科诺夫 (54)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他的经济理论	蔡恺民 (60)
计划与市场统一论者的先驱 ——孔德拉季耶夫	[苏]拉里莎·皮亚舍娃 (81)
著名农学家亚·瓦·恰亚诺夫	[苏]B.巴利亚津 (91)
沃兹涅辛斯基的经济理论	王国杰 (108)
诗人叶赛宁的爱情悲剧	(123)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谈叶赛宁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130)
著名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卢那察尔斯基	[德]德特勒夫·耶纳 (137)
我所知道的马雅科夫斯基之死 ——斯大林私人医生普莱尼夫的回忆	[苏]H·罗马诺彼得罗娃 (154)
诗圣的悲怆奏鸣曲 ——女演员娜拉对马雅科夫斯基自杀的回忆	(159)
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之死	(168)
一、鲍里斯·巴扎诺夫的回忆	
二、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的记叙	
三、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说法	
四、斯大林私人医生普莱尼夫的又一说法	
五、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记叙	

革命文豪高尔基·····	(196)
高尔基之死·····	(213)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谈斯大林和 苏联其他领导人·····	斯维特兰娜 (223)
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之死 ·····	[苏]伊万·茹柯夫 (266)
法捷耶夫战斗的一生·····	(279)
赫鲁晓夫的上台与下台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若列斯·A·麦德维杰夫	(281)
后记·····	(306)

十月革命历史实录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

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星期

苏维埃政权第一个一百天的明显特征，不仅仅表现为对从沙皇政权时代起就已在俄国存在的许多国家机构，以及从1917年2月至10月间出现的那些软弱无力的、病态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强有力的破坏，而且还在于这些机构和组织的纷纷自动瓦解和垮台。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开始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某些机构和组织，以适应苏维埃政权的需要。在这些星期里，千百万工人、农民、士兵的思想觉悟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最初颁布的所有法令——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工人监督条例草案——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机构的巨大支持，对于那些所有外国观察家和苏维埃政权的国内反对者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他们曾经确信布尔什维克甚至坚持不了两三个星期。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还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局势——城市、农村和前线。例如，虽然早在1917年11月就同德国和奥匈帝国达成了停战协议，开始了艰难的和平谈判，但士兵们不是在等待谈判的结果，而是私自逃离前线回家。一些哥萨克的骑兵中队、联队和炮兵退回到自己的营地。前不久还是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在已经溃散瓦解了，前沿阵地赤裸裸地暴露在敌军面前；而且还没有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列宁称之为“有病的肌体”的迅速破坏。在农村，对正在分配皇室、教会、寺院的土地和地主的土地这一进程，同样也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土地革命实际上在

1917年夏天就已经在俄国农村开始进行了，10月的《土地法令》只不过是给了这个革命以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推动力。

《土地法令》规定把所有地主的庄园、皇室、寺院和教堂的土地都置于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管辖之下，“直到立宪会议的召开”。尽管当时没有人去注意立宪会议是否有这个权力，但是，1917年11月和12月却是土地革命得到最大范围的发展，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两个月。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来通过的更为详细的《土地社会化法》，与其说是新的土地革命的起点，不如说仅仅是肯定了既成的事实，并使之法律化了而已；不仅如此，这个《土地社会化法》的许多可取之处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第一个《土地法令》曾提出根据“劳动定额或消费定额”来分配土地，新的《土地社会化法》中提出的分配给每个家庭的农业耕地的数量，也没有“超过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的标准……根据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计算：家庭现有的劳动力人数和家庭现有的人口，包括那些不能劳动的人口”。换言之，新的土地法虽然没有提供没收富农的土地或财产的法律依据，但在法律上也没有为富农家庭的存在留下任何余地。

实际上，富农在农村苏维埃里有着极大的影响，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基本上掌握着农业生产工具、牲畜，拥有雄厚的金融资金。虽然按法律的精神和条文，无论是根据劳动定额水平还是根据现有家庭人口来计算，他们占有的土地已经是够多的了，但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把以前属于地主的大量土地搞到手。

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重视下面这个问题：以前属于大土地所有者所有、建立在良好的组织基础之上的那些示范农场的问题，绝大多数这样的农场都分给了农民。农民们几个世纪以来积压下来的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得到了发泄，经常是毫无顾忌地洗劫地主的庄园，并在分完牲畜、农具等物品以后，常常将地主的住宅付之一炬，虽然这些房屋能够用于农村之急需，例如用来办学校，作图书馆，等等。

不管怎样说，农民获得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土地，他们感谢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同时，前线已经开始“实现和平”，农村青年能够回家了。因此，布尔什维克及其新的同盟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威信，1917年11月和12月在农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通过组织独立的政党，已经完成了自己组织上的发展）作出决定，不但在苏维埃里支持布尔什维克，还要参加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苏维埃政府由此而成为一个联合政府，这就大大加强了它在全国的总的地位。

在最初的一百天内，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经济措施，虽然是匆匆忙忙搞出来的，但总的来说还是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的纲领相符合的。对国家银行实行国有化的同时，一切私人股份银行也都实行了国有化，成为国家银行的分行或储蓄所；许多工厂企业和辛迪加同样也实行了国有化，而且绝大多数工厂企业都建立了工人监督机构。

当然，这些革命的变革不会立即给大多数工人阶级的生活带来理想的改善。因此，很多以前的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教师、铁路工会里的上层人物，许多国有化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在十月革命后马上举行罢工，或者是拒不执行新政权的命令。大多数工厂不得不关门，这或者是由于经营管理者们的破坏捣乱，或者是因为缺乏原材料和资金。铁路运输部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海运和内河航运也是如此。为了粉碎这些破坏捣乱活动，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苏维埃政府机构被迫逮捕了一些主要的肇事官员。不过，这些逮捕行动时间不长，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苏维埃政府释放了关押在彼罗—保罗要塞的前临时政府的部长，克拉斯诺夫将军也因他以自己的名誉担保而获释。在开始的几个月里，列宁曾经想过不使用恐怖手段的问题。他说：“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抓人。是的，我们是在抓人，今天我们还抓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

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①

为了保证在国有化的企业里实行有效的管理，同时也为了进一步在更大范围的工业企业里实行国有化奠定基础，1917年12月成立了隶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接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了各个相应的工业部门，并且在一些行政区域和地方也建立了国民经济委员会。

虽然苏维埃政权提出不用恐怖手段，但是，由于各种各样地下组织的活动和有组织的破坏活动愈来愈严重，看来越来越有必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机构同反革命作斗争，为此，1917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建立同反革命和破坏活动作斗争的全俄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费·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当时，用于惩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措施，包括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剥夺定量供应卡，公布反革命分子的名单，等等，没有出现枪毙人的问题，因为死刑已经正式被废除了。^②

新政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是同全国的一些主要工业中心那里的饥荒作斗争，并向前线的军队提供粮食，这方面的形势确实是灾难性的。虽然，二月革命爆发的直接起因是由于中断了向彼得格勒供应粮食和停止供应军队的粮食，但是，临时政府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里，未能采取任何重要手段使这种形势得到改善。彼得格勒定量供应的粮食，在10月以前就已经减少到每人每天只有200克，即便如此，也难以继了。城市和郊区的粮食储备已所剩无几，而军队的催粮急电还是从四面八方飞向首都，前线仓库里的粮食只够吃几天。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多得简直不可胜数。我们在此仅仅引证其中的一个——肖布和布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59页。

② 参见P.G.索费洛夫《契卡历史中的各种尝试》，莫斯科1960年版，第18页。

科韦茨基 1917 年 10 月 18 日给全俄工厂委员会的报告。下面所引的材料是我们从该委员会的记录材料中看到的：

“在这份关于粮食供应情况的报告中，肖布指出：粮食短缺的问题，早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就已经出现了。1917 年农民们交纳的粮食比往年大大减少，好几个月以来只完成了预定总数的 20—40%，前线的粮食供应也只达到原定计划的 30—73%，前线的粮食储备情况好的也仅仅够再维持三五天。虽然 1917 年的粮食产量并不低于往年，但农民们完全拒绝交出他们的粮食。必须对工业进行调整，恢复城乡之间正常的交换。

布科韦茨基在他的财政情况的报告中，谈到了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的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和战前发行的 16.03 亿卢布相比，现在的纸币发行量已达 162 亿卢布，与此同时，黄金储备量却从战前的 16.03 亿卢布下降到 12.98 亿卢布）。他说，其结果是：卢布不断贬值，由 1 卢布仅值以前的 26 戈比，到后来只值 16 个戈比，现在仅仅值 11 个戈比了。这些严重的后果都落到了工人阶级的身上。应当用下列措施来同财政混乱情况作斗争：建立健康的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对所有的工业品确定固定的价格，提高直接税，减少纸币的发行量。这最后一条措施只有在我们能够成功地从国内借到钱的条件下才能实施。但是，没有人肯借钱给临时政府，因为它没有获得人们支持的基础，哪怕是人口中的一个阶级的支持也好”。^①

不过，国内还是有粮食的。尽管战争期间谷物和土豆的收获多少有些减少，但由于价格上涨，粮食总消费量也在减少，即使是在农村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南方和东部的一些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这些产粮区内的许多地主、富农手里都有剩余的粮食，不仅有 1917 年收获的粮食，而且还有上一年剩余的粮食。但是，由于货币贬值，农民不愿按“固定”价格交纳多余的粮食，

① 参见《新生活报》1917 年，第 158 期。

而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农村；俄国大部分工业在从事军火生产，更何况即使俄国的工业不从事军火生产，也不能算是高度发达的。为了使商业和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必须结束战争，可是，和平谈判可能会拖得很长，而粮食的需要则是眼前刻不容缓的事。布尔什维克认为，不应当受任何出于对私有制的特殊考虑的约束，所以，在他们10月25日掌权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迅速而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粮食问题。工人赤卫队和波罗的海水兵部队接到命令，要他们搜查所有的货栈、仓库和火车站，以寻找粮食。最初几天，仅仅在首都彼得格勒就搜查出并没收了成千上万普特的被藏匿起来的粮食。

人民委员会在一份告全体军队组织、军事委员会和士兵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国内是有粮食的。大土地所有者、富农和商人，他们囤积了许多粮食……反革命分子想让士兵死于饥饿，他们不服从人民政权，不想让农民获得土地，不想立即实现和平；银行经理拒绝贷款给苏维埃政府用于紧急购买粮食。人民委员会已经采取了一些最坚决的措施，人民委员会正同水兵、士兵和工人赤卫队一起在全国各地征集粮食，并把征集到的粮食送往前线。为此，我们宣布向一切投机商、抢劫者、贪污公款者和破坏粮食供应工作的反革命官员进行无情的斗争。我们将逮捕他们，并把他们送到喀琅施塔得监狱关押起来。前线的士兵们，苏维埃政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向你们提供粮食，可望于几天之内，把急需的供给品送到你们手里。^①

11月，改善通往彼得格勒的铁路运输系统和马林斯克亚内河航运情况都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这一成功，才使首都彼得格勒的口粮定量在1917年11月增加到每人每天300克。^②

① 参见波波夫编著的《十月革命：真相与文献》，彼得格勒1918年版，第244页。

② 参见新版《伟大十月的历史》，莫斯科1973年版，第861页。

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由于军队人数的减少也有所缓和。这部分原因是让一批年龄大的士兵复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却是蔓延于士兵队伍的自动回家运动，其总数达数百万人之多。

公正地说，我们应当看到，临时政府领导下的绝大多数与粮食供应有关的机构，以及负责军队供给工作的各类办事机构，在十月革命后继续工作着，它们没有参加政府机关和部门的文职人员举行的普遍罢工活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粮食才能继续按照和以前一样的途径运往城市和前线，尽管和十月革命以前相比，出现的障碍要多得多。然而，苏维埃政府对前粮食供应机构中官员们的忠诚是不可能完全信赖的。随着人民委员会的组成，建立了一个粮食人民委员部，伊·阿·泰奥多罗维奇任粮食人民委员部委员，施利克泰尔是他的主要副手。新成立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很快就开始独立进行工作，并在一些地区成立了自己的粮食供应机构；人民委员会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极广泛的权力，要求各级革命军事委员会全力支持它的各个部门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都成立了由工人、水兵组成的第一批粮食征集队，它们带着用于交换、而且又是农村急需的生活用品，以及征集余粮用的小册子深入到农村搞粮食。按照波德沃伊斯基回忆录里的说法，仅仅在彼得格勒大约就有 7000 人参加了这样的粮食征集队下乡征集粮食。^①

在此，我们有必要谈一谈粮食供应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前所述，苏维埃政权为了城市居民供应粮食，进行了“有组织”的艰苦努力；但与此同时，粮食供应中的“无组织的”粮食交易几乎到处都在继续进行。因为，一方面城市里急需粮食；另一方面，农村里的所有农民——富农、中农、贫农——又急需诸如煤油、火柴、纺织品、工具和一些最简单的农业器具这样一些产品，以及铁钉、针线、厨房用具等等。战争期间粮食价格曾经上

^① 参见波德沃伊斯基：《1917年》，莫斯科1958年版，第184—185页。

涨过，但是还没有出现过这样根据所有农村急需的工业品来确定粮食价格的情况，自从出现了那种互相需求对方产品的所谓自由市场（常常称之为“黑市”）以后，开始有了这种以物易物的情况。尽管有各种禁令和不准开设自由市场的措施、办法，但一直收效甚微，自由市场还是照开不误。农民和投机商们千方百计地设法把粮食运到城里，用它们来换取工业品。虽然在自由市场刚出现的头几个星期里，苏维埃政府有关机构很快颁发了同粮食投机作斗争的几项法令，直至“就地枪决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①但是，在11月和12月里，这些极端的措施常常只是宣布一下而已，并未怎么贯彻执行。“就地枪决”的情况——如果确实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总的看来，自由市场的存在是帮助布尔什维克在第一个一百天内保持政权的一个不小的因素。

立宪会议的召开与解散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临着许多紧迫的任务：必须巩固政权，与德国人签订和约，设法向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前线运送粮食等等。因此，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似乎完全不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事情。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没有能够通盘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在处理立宪会议的问题中，由于他们从自身的立场出发，作出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估计。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看来是占第二位的東西，而且在某一特定时期实际上也是占第二位的東西，发展到下一阶段就会转变为极其重要的東西。立宪会议发生的情况多少具有这种性质。

二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列宁回到俄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14页。

要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口号。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鲍里斯·索柯洛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所有的政党中，只有社会革命党同立宪会议的思想联系最紧，同立宪会议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我甚至可以说它们是统一的有机体，是用一条纽带相连的。立宪会议体现了革命人民的主要要求，集中了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正是出于这些考虑，促使社会革命党人坚持全俄立宪会议的主张。看来，对于他们（不仅是他们）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召开全国立宪会议”。从理论上来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或许是可行的，实际上也有可能，其中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真理，但事实上，这种独特的理想主义充满着最让人头痛的后果和复杂的情况。

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是人民非但不是满怀信心地去拯救立宪会议的权力……相反，从一开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许多前线的士兵根本就不知道，也不清楚立宪会议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保留地、公开地、真诚地拥护苏维埃。苏维埃成了他们接近和亲近的机构，使他们回想起村社会议。从刚开始，前线地区的一些苏维埃会议就吸引了许多局外人来参加，这些人常常干预会议的议程，影响会议作出的决定。看来，无论是被士兵们叫作“我们的苏维埃”的军队委员会，还是一些大城市里的苏维埃，都和这些人的关系很亲近，因此，他们的那些活动就可以理解了。在刚开始的几个里，我有机会多次听到士兵们对立宪会议的意见，除了那些为数不多的有知识的士兵以外。大多数反对立宪会议的士兵认为，立宪会议是同国家杜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同他们没有什么联系的机构。“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苏维埃，我们的代表已经在那里开会，苏维埃能够决定一切，并且知道如何去做这一切，还有什么必要再来个什么立宪会议呢？”^①

① 参见《十月革命》，莫斯科—彼得格勒1926年版，第332—333页。

这样的情绪不仅在前线的士兵之中存在，在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中也同样存在。但是，布尔什维克在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并没有拒绝立宪会议的口号，也没有以苏维埃的口号来反对立宪会议。事实是：尽管长期以来，由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压力，布尔什维克表面上也支持立宪会议；但在社会革命党寻找各种理由反对马上召开立宪会议时，他们也在自己的宣传中利用了这一点。

实际上，临时政府的社会基础和法律根据只能用一种方法来加强——迅速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将在非法的国家杜马的残余和苏维埃迅速激进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本来，若是在1917年春季和夏季迅速召开立宪会议，那时是不会有什麼严重障碍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的基本原则几天之内就定下来了，而对选举法细则的详细说明本来就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是，在各种委员会里，却以人们所能想到的各种解释在那里争论不休。这项工作毫无必要地被拖延了，因此，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也就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和同它们结盟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蓄意破坏而无限期地拖延了。促成立宪会议不能及时召开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宣称，它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机构，不负责进行社会改革。例如，临时政府断然拒绝进行人们盼望已久的土地改革，认为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只能等全俄立宪会议来决定。确切地说，临时政府之所以蓄意推迟召开立宪会议，是为了拖延进行这样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第二，如果在1917年春夏之际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的话，不难预料，资产阶级政党不会获得多数，因为它们在群众中已经失去影响，而那些无产阶级的政党将会获得多数，特别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但是，在当时，这些由妥协分子组成的政党不愿意，甚至害怕对国家的命运负责而不顾一切地坚持同资产阶级政党搞联合，寄希望于资产阶级政党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将会限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无原则的政

治活动。当时，必须通过一些法律，作出一些决定，但当时这两个最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却缺乏当机立断、敢作敢为的精神，因此，1917年7月上台、本来可以很快就召开立宪会议的克伦斯基政府，仍然处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控制之下，继续拖延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所以，毫不奇怪，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的宣传战武器库里，又增添了迅速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这是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早在1917年春天，在回答是否应当召开立宪会议这个问题时，列宁就写道：“应当召开，而且要快些召开”。^①

在1917年夏季的几个里，布尔什维克一直抓住这个政策不放，作出愿意召开立宪会议的姿态，使之与临时政府推迟召开立宪会议形成鲜明对照。

著名的彼得格勒六月示威游行前不久，临时政府曾经宣布9月30日召开立宪会议，9月17日为立宪会议选举日。但是，到8月9日，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在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又把选举推迟到11月12日，把立宪会议的召开推迟到11月28日。即便如此，到时候是否能如期举行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仍然是没有保证的。

后来，在平息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及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这两个主要城市的苏维埃里获得多数，开始在其他一些城市和军队的苏维埃里取得胜利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曾经一度暂时不提的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又重新提出来了。此时，列宁已经断定不可能再有和平革命，开始极力主张布尔什维克加速准备进行武装起义。

当然，布尔什维克在9月份还不会反对马上召开立宪会议。不过，立宪会议只能由控制政府机构的人来主持召开。换句话说，只能由临时政府来发起召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布尔什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94页

克党把它的重点放在尽快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希望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赢得多数，以革命的领导取代被妥协分子把持领导权的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种新的形势迫使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们开始热衷于准备进行立宪会议选举，试图以一种议会前的组织形式为自己获得一定的支持，而这种议会前的组织形式只是不伦不类的模仿代议制机构。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极力反对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张。他们争辩说：没有必要再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因为马上就要召开立宪会议了。至于其他一些右翼党派，它们既害怕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也害怕召开立宪会议，继续梦寐以求地要搞一次军事政变，在俄国建立军事独裁。当时一家反动报纸《新俄罗斯报》写道：

“布尔什维克和左翼政党的影响，在我国正在不断增长。据初步估计，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大约可获得 30% 的选票，社会革命党人获得的选票则不会低于 40%。”《新俄罗斯报》呼吁说：“要求推迟选举，反对临时政府的新的愚蠢行为，使政府从昏聩中觉醒过来！振作起来！！开始行动！！！只有我们哥萨克人才能为俄国的政权提供真正的、毫不掺假的基础。”因此，这家报纸要求立即释放哥萨克领导人，通过让哥萨克人组织政府来“净化权力之源”。^①

正如我们所知，围绕着是否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所进行的斗争，最后以布尔什维克和支持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胜利而告结束。同时，绝大多数地区都决定支持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们奉命正开始抵达武装起来的彼得格勒。为了使代表们能中途改变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开始给那些反对在此时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

^① 《新俄罗斯报》，1917年10月8日。